

希腊化与罗马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方 晓 东

中央教科所

罗马教育思想是在罗马教育希腊化^①与抵制希腊化的过程中开始萌芽,并在继承希腊教育思想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先后产生了加图、瓦罗、西塞罗、塞涅卡、昆体良和普鲁塔克等著名教育家。加图和瓦罗关于教育的论述反映了当时罗马教育从家庭教育向学校教育转变的状况,具有具体、局部和描述性的特征。西塞罗的教育思想反映了在希腊文化教育的影响下,罗马教育传统的巨大转变,并将希腊的教育思想与罗马的教育理想成功地融合在一起,标志着罗马教育思想的真正形成。在他之后的三位教育家塞涅卡、昆体良和普鲁塔克也从理论上对罗马教育进行反思和探索,提出了各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罗马教育思想。本文着重阐述罗马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程。

一、希腊教育思想的广泛传播

在希腊化时期,由于亚历山大和罗马的扩张,迫使希腊人到处流亡。希腊人每到一地就办起学校,传播希腊文化。公元前 272 年,罗马人占领了希腊在意大利半岛的殖民地塔伦顿(Tarentum),许多希腊人被作为奴隶带到罗马,其中有一位希腊著名的文法学家安东尼库斯(Zivius Andronicus)也被胁迫到罗马。在罗马,他被分派到学校教书,从此,罗马便有了最早的希腊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他发现罗马学校的课本十分贫乏,于是就动手把

《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记》翻译成拉丁文。《奥德修记》立即成为罗马学校的重要课本,成为《十二铜表法》以外的补充读物。这样希腊文化教育便在罗马得到了初步传播。与此同时,一些外交使节和商人也充当了希腊文化的传播媒介。一些罗马青年先后到雅典等希腊城邦留学,也成为传播希腊文化的重要力量。

希腊文化和教育的广泛传播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罗马文化的形态,而且促进了罗马教育的新发展。这一时期,罗马的私立学校不断出现,许多希腊教师也纷纷到这里授课讲学,学校教育开始在罗马发展起来,形成罗马传统的家庭教育与希腊式的学校教育并存的局面。不过,这时的学校教育范围还很小,其教育对象也仅仅限于上流社会的少数青年。罗马对希腊的最后征服,直接促使希腊文化教育的进一步传播。希腊的哲学、文学、艺术、科学和教育成为古代文明的公共财富,被广泛介绍到罗马。希腊人遍及世界变成了世界的导师。罗马人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但这并不意味着,罗马人只是将希腊文化教育简单地移植到罗马及被其征服的广大地区的土壤。实际上,罗马人在学习、借鉴和广泛传播希腊文化教育的过程中,结合本民族的实际需要,提出了富有特色的教育思想,进而影响了西方教育思想的演化过程。

二、罗马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罗马教育的希腊化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期,这就构成了罗马教育思想萌芽与罗马教育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罗马教育思想的萌芽

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为罗马学习、借鉴希腊教育的时期,也是罗马教育思想的萌芽阶段。在这个时期以前,罗马人已仿照希腊建立了卢达斯(小学)。公元前3世纪,由希腊人在罗马建立了希腊文法学校(中学)和希腊修辞学校(高等专业学校),教师主要是希腊人,教科书是从希腊学校引进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育目的也都受到希腊教育的影响。由于当时罗马没有大学,希望继续深造的青年先后到雅典等地希腊大学留学,学习希腊的文化科学。他们深受希腊文化的熏陶,并致力于传播希腊文化和教育。希腊文化教育的引进不仅丰富了罗马教育的形式和内容,而且对罗马的教育观念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个转型时期,希腊教育的影响必然与当时盛行的罗马教育传统发生直接的冲突。一些罗马人认为,希腊文化、教育和生活方式的传入,严重损害了罗马人的生活和道德规范,破坏了罗马的文化和传统。而在他们看来,罗马的传统美德是罗马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们本着爱国热情,坚决抵制希腊文化教育的影响。公元前173年,元老院以宣扬享乐主义为由,下令驱逐了两名伊壁鸠鲁派教师。12年后,元老院又发布禁令,禁止希腊哲学家及修辞学家在罗马居住。

与此同时,希腊文化教育的引进及其与罗马文化教育传统的冲突,引起人们开始关注和探讨教育问题,从而促使罗马教育思想萌芽。主要代表人物有加图、瓦罗等人。

根据现有的文献史料来看,加图是古代罗马最早关注教育问题并尝试撰写教育著作的人之一。加图(Cato,公元前234—前149年)是古罗马著名的政治家,历任罗马行政长官、执政官和监察官等高级公职。他同时也是

一位作家、演说家,用拉丁文写作了《起源》、《论农业》和《道德格言》等著作,并发表了演说一百余篇,是拉丁散文的奠基者之一。在罗马教育史上,加图同样具有一定的地位。他曾写过一本论述儿童教育的著作,可惜没能保存下来。但是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一书中转述了加图关于子女教育的观点和实践。

加图把子女教育视为头等大事。在他的儿子出生之后,主要由其妻子亲自喂养。他一旦有空,就来亲自照顾儿子,如陪着妻子给儿子洗澡等。待儿子开始懂事时,他就把儿子置于自己的教管之下,教他读书。当时,在加图的家中,有一个曾当过教师,精通文法的奴隶。但加图认为,让他的儿子给奴仆责骂,或者由于学习迟缓而让奴仆拧儿子耳朵是不对的。于是他自己担当起家庭教师的重任,亲自给儿子教授文法、法律^①以及各种必要的课程;同时教儿子投铁饼、骑马、拳击、游泳,进行军事体育锻炼。出于对儿子进行爱国主义和传统美德教育的需要,他还亲手用正体字写了一部罗马史,使儿子不必出门就能了解和熟悉自己的祖先以及他们的传统习俗,并学习罗马民族的传统美德。此外,加图还非常注重身教,严格要求自己在子女面前如同在神面前一样,绝对不使用有失体统的言词,并且绝对不和子女一同入浴^②。

显然,加图所实施和推崇的是罗马的传统教育。他所追求的教育理想是培养罗马的合格公民。他认为,合格公民应具有传统道德品质,通晓讲演、法律、历史、医学、农业、军事等实用知识和技术,体魄健全,行为举止庄重得体。教学方法以言传身教为主,辅以课本教材。

在希腊文化教育大规模传入罗马之际,加图为了维护罗马的文化传统,极力抵制希腊文化教育的影响。他指出,罗马人过去能击败大希腊、西西里和希腊本土的联合反抗,但

却输入了希腊文明,使之征服了罗马人。由于罗马远征军带回了希腊艺术品、书籍、学者、教师、家奴、装饰、习尚以及各种奢侈品和大量财富,使罗马人追求舒适、悠闲、安逸和个人主义方面发展,而集体主义精神和克勤克俭等罗马传统的道德风范遭到削弱和背弃。正是出于这种担心,他于公元前155年,建议元老院将来讲学的两名希腊哲学家驱逐出罗马。不仅如此,加图还撰写了一部名为《起源》的历史著作,呼吁罗马人注意传统道德已处在崩溃的边缘,提醒罗马人要爱护自己民族的传统美德,莫忘公民职责和尚武精神。不过加图并不是完全否定和排斥希腊文化教育。他接受罗马起源与希腊神话的联系,承认一些意大利人来自希腊。他不喜欢雅典人的浮夸巧辩,但自己却潜心研究雄辩术,热衷于演说,能言善辩,成为罗马的著名演说家。据西塞罗说,在加图去世一百多年之后,他的150多篇演讲辞仍保留下来。他的《起源》一书中收入了自己多篇演说辞。

总之,加图在教育上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实施和保持罗马的传统教育。他通过亲身的经历,具体而详细地描述了罗马当时盛行的家庭教育。他的有关论述反映了罗马传统教育的形式、内容和方法。

古代罗马百科型学者和教育家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公元前116—前27年)则与加图不同,他所关注的是学校教学内容的问题。他学识渊博,在语言文字、历史考古、哲学、自然科学、农业等多方面都有研究,著作多达数十种数百卷。可惜只有少量保存下来。主要著作有《古代史》、《学科手册》和《训练九篇》等。

《训练九篇》(Discip Linarum Libri IX),又称《教育九卷》,共分九卷,是百科全书式的著作。瓦罗在该书中分别阐释了当时文法学校盛行的自由七艺——文法、修辞学、逻辑学、算术、地理、天文和音乐。此外,还着重讨

论了医学和建筑两门学科。《训练九篇》长期作为文法学校的重要教材,其写作方式对以后许多罗马作家的创作产生了影响,从而掀起了百科全书运动。昆体良的12卷本《雄辩术原理》,便是该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

《学科手册》(De Lingua Latina)亦称《拉丁语论》。瓦罗在该书中将拉丁语中的词分为可变格的词和不可变格的词,还讨论了纯粹拉丁语的奇格的词尾变化形式,确定了规则动词变态体系。为拉丁文法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长期作为拉丁文法学校的标准教科书。

综上所述,加图和瓦罗关于教育的见解,还是具体、局部和描述性的,而不是对教育普遍性问题的理性的认识与分析。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罗马仍处在从罗马传统的家庭教育转向学校教育的转型时期,两种教育制度并存,学校教育制度还未完全确立起来。

第二个阶段:罗马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476年,为罗马将希腊教育本土化或拉丁化的时期,也是罗马教育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阶段。在这个时期,希腊文化教育大规模传入罗马,从根本上影响了罗马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教育观念。在这种情况下,加图式的抵制方式显然不可能产生任何实际效果。罗马人在希腊教育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具有罗马民族特色的学校教育制度,罗马的文化教育传统与希腊的文化教育逐渐融合在一起。现实促使罗马的思想家们进一步认识了希腊文化和教育并寻求到一种既能保持固有的传统,又能接受高度发展的希腊文化教育的管理方式,从而促进了罗马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这个阶段教育思想的突出特点是,对教育现象的认识已逐步过渡到理性把握和反思的水平,标志着罗马教育思想的真正形成与发展。当然,这个阶段罗马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以前一阶段所取得的思想成果为基础的。主要代表人

物有西塞罗、塞涅卡、昆体良和普鲁塔克。

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前43年)和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约公元35—96年)着重阐述了雄辩家的教育问题。雄辩术起源于希腊。在共和早期,雄辩术就从希腊传入罗马,并在罗马公民的政治和社会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到共和晚期,雄辩术进一步成为人们从事政治活动和进入国家领导层的工具,因为当时只有雄辩家才有希望跻身于罗马的统治阶层,进而成为官运亨通的新贵族。于是以培养雄辩家为目的高等专业学校——修辞学校便蓬勃发展起来。罗马教育逐渐从培养农夫——军人的教育转向培养雄辩家——政治家的教育。罗马教育的这种重大转变,促进了罗马教育思想的新发展。西塞罗不仅是罗马雄辩家的佼佼者,并且在理论上较系统地论述了雄辩家应具备的素质及其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反映了当时罗马高等教育的理想和罗马教育传统的巨大转变。西塞罗的教育思想不仅真实地反映了这种巨变,而且在理论上进一步阐明要把雄辩家培养成既深受希腊文化熏陶,又具有罗马传统道德、精通法律和军事、具有实际工作能力,举止庄重得体的全面发展的人。从而在理论上成功地将罗马文化教育传统与希腊文化教育影响成功地融合在一起。西塞罗的教育思想对教育现象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较为完整的认识与分析,标志着罗马教育思想的真正形成,并促进了以后罗马教育思想的发展。罗马进入帝国时期以后,罗马皇帝独揽大权,政治家只需奉旨办事,已不能对国家的重大政治问题公开发表自己的主张。雄辩术失去了过去就政治问题发表演说,进行辩论或影响公众舆论的作用;人们只是在法庭上还需要雄辩术进行控告与辩护,于是雄辩家变成了辩护师或律师。昆体良所论述的雄辩术原理就是关于培养优秀雄辩家——律师的理论和方

法。他从理论上系统地总结了加图、西塞罗等教育家的思想,以及罗马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实践经验,提出从未来雄辩家咿呀学语开始教起,直到其成为一个合格的雄辩家的一整套教育理论,从而突破了西塞罗仅局限在高等教育的范围内讨论雄辩家的培养问题。他在其12卷巨著《雄辩术原理》(Institutio Oratoria)中全面阐述了雄辩家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教学过程和教师等问题,形成了独特的教育思想体系,对西方教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约公元前4—公元65年)系统探讨了道德教育。从其表述方法来看,主要采取了书信的形式,以“道德箴言”闻名于世。重视德育是罗马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塞涅卡对道德教育的重视并非偶然,既有斯多葛主义者的哲学信念,同时也是民族文化心理和社会现实的产物。塞涅卡的道德教育思想包括道德教育的内涵、目的、途径、方法等,基本上构成了一个道德教育的体系。此外,他还论述了关于雄辩术教育、教育方法、学习方法等许多重要的教育问题。其中包含了对罗马教育的反思和探索,具有明显的理性特征。如果说西塞罗的教育思想标志着罗马教育思想真正形成,那么塞涅卡的教育思想就使罗马教育思想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因此,应把塞涅卡的教育思想视为从西塞罗教育思想发展到昆体良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

与昆体良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普鲁塔克(Plutarchis,约公元46—118年)所关注的却不是雄辩家的教育问题,而是普通教育问题。他强调对儿童必须进行德、智、体诸方面的教育,使他们成为品德高尚、学识渊博、身体健康的罗马优秀公民。这是由于普鲁塔克出生于希腊,受教于著名希腊学者阿谟尼乌斯,青年时期曾广泛游历雅典等希腊历史名城,深受希腊文化的熏陶。因此,

在普鲁塔克的教育思想中,希腊文化的因素要大于罗马传统的因素。这是他的教育思想不同于西塞罗、昆体良等人的一个显著特点。但由于受晚期斯多葛主义的影响,他们的教育思想也有一些相同的地方。普鲁塔克的教育思想表达了罗马人把新一代培养成全面和谐发展的优秀公民的要求,对古代罗马的教育实践产生了实际的指导作用。

罗马教育思想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既是对希腊教育思想的继承和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实践和发展了希腊的教育思想,特别是罗马教育思想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强调组织管理,重视道德教育,以及关注普通国民教育等特点对西方教育思想传统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597

注:

①希腊化源自希腊文 *hellenizein*, 本意为“说希腊语”或采取希腊人的言行模式。在史学上通常指公元前 334 马其顿王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 公元前 356—前 323 年)开始东征,到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这段历史时期。希腊文化走出本土疆界,广泛传播,并与地中海沿岸各国经济和文化互相交流、影响并融合成为统一的文明。希腊化时期结束的时间历史上有不同的分法,有的以政治的标准来衡量,分到公元前 146 年或公元前 30 年;有的则以文化教育的标准来衡量,分到公元 476 年。我们这里采取了后一种分法。

②指《十二铜表法》。

③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第 366 页。